

论网络言论表达的边界及“越界”治理

■ 刘 冬

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88

【摘 要】当代中国正迈向信息社会时代,互联网的兴盛促使网络言论表达呈现出集体行动景象,这容易导致网络言论表达的“群体极化”,从而产生网络言论表达的“越界”问题。国际公约、国内法律法规等均对言论表达的界域有明确规范,如言论表达不得危害国家和社会秩序,不得侵犯他人权利和名誉等。未来中国对于网络言论表达“越界”行为的治理应采取宽容与合作模式,政府与网民应交互相理解,政府对网民须更多宽容,网民则应树立起一种负责任、有担当的公民美德。

【关键词】互联网 言论表达 边界 越界

毋庸置疑,当代中国正逐渐迈向信息社会时代。随着信息技术普遍推广,尤其是发达的互联网为民意的表达、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全新平台,一个中国式的“电子化公共领域”正在悄然兴起。“互联网既是非制度政治参与的重要管道,本身也是一种公共舆论,甚至还作为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动形式。”^[1]由于互联网时代构筑起了中国公民言论表达自由权利行使的新型“场域”,言论表达自由权得以大为张扬,民主政治似乎看到了普照的光芒,但同时,互联网的弊端也是明显可见,网络言论表达的问题叠出不穷。因此,在信息社会背景下,公民言论自由的边界及“越界”治理等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一、网络言论表达的集体行动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突破5亿,达到5.13亿,全年新增网民5580万。互联网普及率较上年提升4个百分点,达到38.3%。^[2]这一庞大群体,由于难以被户籍管理和身份识别系统监管,他们可以以更为模糊、多元的面孔在互联网上游弋。“既可以轻易跨越信息化的领土边界,又能在瞬间聚集起群情激愤的议事广场;既可以冷静理性的表达对单个议题的个人见解,也能快速促成地面集体行动。”^[3]正如学者所言,“民意在网络上的现身,不再是嘘的一声,而是轰的一声;不再是意见领袖振臂高呼,而是陌生人成群结队。”^[4]

毫无疑问,因应于信息社会的背景状况,中国公民网络言论表达似乎正呈现出一种集体行动的景象。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曾深刻地指出,一个心理群体表现出来的最惊人的特点如下: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不管相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得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个人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5]因此,当网民的网络言论表达行为构成一种集体行动时,他们极易产生极端心理,且由于“集体意识”的存在及互联网的匿名性,导致这种极端心理短期内难以消弭,因此,超出言论表达自由边界的话语表达便呈现出频发态势,且难以控制。这可以从当下政府对于言论表达控制并不可观的社会治理现状得以印证。网民呈现出一种“N重自我的放肆表达”样貌,失去某种“社会化”控制的网民,不再需要以循规蹈矩的方式表演和观看,自然有胆量甚至乐意去展现各种自我,尤其是情绪化的自我与夸张的自我。

概言之,一方面,由于互联网个人网站、论坛、博客、微博等自媒体所固有的匿名性、难以控制性,其间的公民言论表达存在严重弊端:“一种‘盲人牵盲人’的现象不断生发,众多网民向不计其数的读者提供了未经核实的信息,无知、误导和误报不断循环往复。”^[6]另一方面,网络言论表达呈现集体行动形象,而集体行动又极易导致言论表达“越界”,甚至出现极端的“群体极化”等狂躁状况,这构成中国政府对互联网进行有效控制、治理的重要难题。

二、网络言论表达的法律界域

任何权利和自由都不是绝对的。言论表达自由同样如此,其有着内在制约,即“不可侵犯的人权还要包括受‘不可侵犯他人的人权’,‘不能承认侵犯他人人权的行为是行使人权’等制约。”^[7]《布莱克法律辞典》明确指出:“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绝对的。言论的种类是有明确定义和恰当限定的。对诸如猥亵、淫秽、亵渎、诽谤、侮辱、挑衅等言论的禁止和处罚就不会引起宪法问题。”^[8]作为言论自由权行使的新型方式,网络言论表达同样需要划定边界。对于言论自由的界域,国际公约、我国法律法规中都有明确规范。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0条规定:“(1)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应以法律加以禁止。(2)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我国现行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为保证公民言论自由,我国先后颁布了《音像制品管理条例》(1994年)、《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出版管理条例》(1997年)、《娱乐场所管理条例》(1999年)等。在上述条例中,国家与政府都重申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公民言论表达自由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明确指出,公民在行使其言论表达权利时,须遵守宪法、法律的相关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或者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上述法律文件所涵括的限制性内容主要有:反对宪法基本原则;危害国家主权、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宣扬淫秽、迷信或者渲染暴力;侮辱或者诽谤他人的;等等。

整体而言,上述规范性文件的限制性内容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国家、社会等集体,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二是针对个人,侵犯他人权利和名誉。这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的规定基本一致。此外,理论上讲,按对象可分两种:针对内容的限制及非针对内容的限制。前者指限制某一观点的言论或某种类型的内容,如删除某些帖子、跟帖或博客、微博文章等;后者则是针对其表达方法或管道,如取缔某些非法网站,要求某些互联网站整改等。当然,虽是非针对内容的限制,但事实上却造成针对内容限制的效果。

三、网络“越界”言论的治理模式

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网络言论表达呈现出一种“无政府主义”泛滥与政府严厉监控、治理互动增长的吊诡现象。一方面,国家越是对网络言论表达严厉监控,网民就愈发呈现敌视态度,“越界”言论也愈多;另一方面,网络言论表达“无政府主义”越为泛滥,“越界”言论越多,政府就越是通过各类手段加强监控。对此,网民与国家似乎都存在一定问题。首先,网民对国家、政府的理解与信任不够,事实上,一种乌托邦式的独立网络空间的基本设想不切实际,网络有其固有弊端,网络言论表达的诸多“越界”行为必须由国家、政府进行治理、规制;

其次,国家在对网络言论进行治理时也存在刚性过多、柔性不足问题,国家对网络民意表达的容忍不够,甚至某种程度上已侵犯了公民基本的言论表达自由权。笔者认为,未来中国针对网络言论表达的规制应走向一种宽容与合作的治理模式。具体而言,包括如下方面。

其一,从双方互动角度来看,政府与网民应当更多地交互理解。国家应当某种程度上反思“稳定压倒一切”的刚性政治策略,寻求一种更有耐心的柔性策略;网民也应摒弃“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对政府展示更多信任。正如有论者所言,如果政府对民众的认同有信心,对民众的成长有耐心;如果精英阶层对民众的智慧有信心,对民众的学习体验有耐心;如果民众对政府和精英阶层的善意有信心,对他们纠正惯习和校正航程有耐心,那么,所谓治乱的困局应当会少一些,而互谅合作的可能应当会多一些。^[9]

其二,作为强势一方的政府应当对网民持更多宽容。尤其针对批评官员的网络言论表达,更应持一种谨慎对待态度。在民主社会的基本框架内,我们应在某种程度上认可:批评官员的尺度就是民主的尺度。^[10]只要网民的批评言论针对的是官员公职行为,而非完全针对个人私生活、名誉的人身攻击、诽谤,就不应认定为言论表达“越界”行为,而且,即便是针对名誉稍微有所“越界”,也应给予相当宽容。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伦南所言,作为官员,必须要接受“自己被曝光”的现实,接受公民可能有所出格的言论批评,因为这是在“文明共同体中生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11]

其三,就网民一方来讲,需要树立起一种有责任地参与公共政治协商的公民美德。更多地以客观、负责任地态度对公共事务表现出关注并投入公共事业,而非总是呈现出一种极端化的情绪表达。当然,由于民族文化的劣根性短期内可能尚难扭转,公共参与的政治美德或许也难以有效推进,但至少必须树立起这样一种美好愿景的想象。而身为网民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进行深入反思和检讨。■

(上接第25页)

是向社会贡献自己的爱心,同时感染更多的人将爱心、能力、金钱贡献于社会。同时应该让受助者知道,这份帮助和关爱来自于社会,希望他们能感恩于社会并回报于社会。

(二) 慈善组织应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加强慈善组织的竞争力

慈善组织内部可招聘职业经理人对资金进行管理,保证慈善基金不贬值并且尽可能将现有的资金进行扩充。慈善组织内部应该要建立完善的约束与激励机制,一方面防止组织内部出现贪污善款现象,一方面激励更多的人才投身于慈善事业,壮大慈善组织的力量。慈善组织需要专业人才的加入,各领域的慈善组织应该招募相应领域的专业人才,以提高慈善组织的专业性,以及确保慈善组织能够在该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 慈善组织应建立规范、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

慈善组织的发展光有自律是不行的,只靠政府进行监督也是不行的,必须建立一套规范、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以增强他律,让媒体、公民能够对慈善组织进行监督。由于我国慈善组织缺乏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导致了社会对我国慈善组织的不信任,这不仅使慈善组织与公民之间产生了隔阂,更影响了公民的捐赠热情以及加大了慈善组织的募捐难度。为了提升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促进慈善组织良性发展,对慈善组织进行合理的监督与约束,慈善组织必须公开其财务信息,以及每个项目的捐赠信息,还应该建立一套规范的信息反馈制度,如收取受捐助者的接收证明等,以对社会、捐赠者加以交代。

我国参照美国基金会中心,成立了中国的基金会中心网,该网站是在民政部支持下,由30多家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发起成立的,已于2010年7月8日正式启动。该网站上公开披露了基金会的信息,包

参考文献

- [1]黄荣贵:《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理论模型、中国经验及研究进展》,《社会》2010(2)。
- [2]CNNIC:《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2年01月17日。
- [3]李永刚:《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p45。
- [4]王怡:《网络民意与“程序正义”》,《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月19日。
- [5](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p14。
- [6](美)安德鲁·基恩:《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丁德良译,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版,序p4。
- [7][8](日)杉原泰雄:《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吕昶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p25。
- [9]李永刚:《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p236。
- [10][美]安东尼·刘易斯:《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何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序。
- [11][美]安东尼·刘易斯:《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徐爽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p69。

作者简介

刘冬,男,1980年1月,汉族,四川新津人,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学。

括基金会数量、基金会的基本信息、财务信息、项目信息等情况。

该网站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基金会的信息公开,成为了社会以及捐赠者对基金会的动态进行监督的平台,但是该网站上的信息除了基金会的数量更新至今之外,其余信息都只是截止于2010年,也就是说,社会只能通过该网站看到基金会2010年之前的信息,而不能关注其实时信息。要完善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制度,提升社会公信力,各组织必须将组织的实时动态公布于网上,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公开、透明,否则所有的网站都将只是一个摆设。

小结

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做好事,而一个坏的制度也能让好人做坏事。我国政府应该在制度上对慈善组织以约束、支持,帮助慈善组织成长与发展。而慈善组织也应该规范组织管理,加强自身能力,发挥本身优势,以平等的地位与政府合作。政府应该赋予慈善组织以合法独立地位,慈善组织也应该尽快摆脱政府的控制,两者之间应形成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只有两者形成良好的互动与合作,才能够更好的整合社会资源,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郑功成.当代中国慈善事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 [2]徐麟.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3]黄家瑶.比较视野下的中西方慈善组织[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 [4]巢莹莹,陈微.中外慈善组织政府管理比较及启示[J].经济师(社会科学版),2009,(1).